

毛泽东住中南海也要付房租

1998 年夏末，笔者在主持刊物工作时有机会读到毛泽东的 1968 年 1 月家庭生活收支详细账，并从中了解了不少内容。

账目的收入部分有三栏，分别是：“上月接转 14095.45 元；毛泽东工资 404.8 元；江青工资 243 元。”

那个年代，一个国家主席家中有一万多元活钱在账上不新鲜，特别是毛泽东，据毛泽东警卫李银桥说，毛泽东 20 世纪 50 年代的稿费就达 100 万元，毛泽东本人不经手，由中央特别会计室管理。家用不够，或有重大的花销时，经毛泽东同意，从稿费中拨转、开支。

毛泽东的工资 404.8 元，1955 年 7 月国家行政机关人员实行薪金制时定的，直到他离世一直没动；江青

的工资 243 元，是当时的文艺二级，后来文化大革命，她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下调到 342.7 元。那时全国人民工资都不动，她能一下长近 100 元钱的工资，也是破天荒。

支出一栏列有六项：“月房租费 125.02 元；12 月、1 月党费 40 元；日用消费品 92.96 元；液化气 9.6 元；伙食 659.13 元”，“送王季范、章士钊 4400 元”。

毛泽东住中南海付房租费，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不是有这个账目在，我还以为首长住房是供给了，因为 1955 年以前干部都是供给制，直到现在，有许多地方还保留着供给制的尾巴。

日用消费品，据说此账之外，还专有一个日常杂费开支表，其中包

括毛泽东买书，孩子的衣物、生活用品，老家亲友来访在京的花销、往返路费，江青看戏、买唱片和摄影方面的花费。据说在生活费用开销上毛泽东很注意节约，平时不过问，月收支不平衡，钱不够用时，毛泽东就找工作人员来，询问查对，叮嘱注意节俭。

1955 年实行薪金制以后，李银桥曾草拟过一个《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毛泽东批示了照办。那上面列的主要开支是 9 个项目，其中主食 450 元；副食品 120 元；日用开销 15 元，加上杂支零用 18 元，才 33 元，但那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到 1968 年，中国第一家庭的日用开支 92.96 元，也没逾百。

伙食 659.13 元，比 20 世纪 50

最高人民检察院重建幕后

首接万言书替人洗沉冤

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后直接复查的第一起冤案，是郭子光被错定为反革命获刑案。1957 年暑假，读高二的郭子光回到老家山东广饶县孙郭乡北郭西村，根据学校布置，利用暑假期间配合当地搞宣传工作。

郭子光看到了当时《人民日报》上有篇文章，关于反对干部特殊化，便抄在小黑板上，一村干部看到后便说：“这是写的咱……他在骂咱。”村干部没有公开说什么，过几天粉笔字被大雨淋了，郭子光也没有把这当回事。

暑假期间，郭子光给村里的农民进修班上代数课。突然几名村干部破门而入，指着郭子光说，他是右派。次日晚上，北郭西村召开全村大会，郭子光的父母被押到主席台前低头听候“宣判”，他们一家就成了“右派集团”。

1964 年 11 月，郭子光最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 15 年，1968 年 8 月，又被加刑 4 年。

1969 年，郭子光开始申诉，他记下自己被判刑的详细过程，每年 3 至 5 本，每本两万字。申诉每次都被驳回：“罪大恶极，铁证如山，驳回申诉。”每驳回一次，他都要接受“不认罪”、“反改造”的指控和批斗。

“我想给检察院写申诉，但检察

院在‘文革’期间已经不存在了。”郭子光说，最后一线希望也没有了。实际上，1966 年“文革”爆发后，全国掀起了“砸烂公检法”的浪潮，政法系统遭到破坏，其中受损最严重的是检察院。1968 年，毛泽东同意撤销最高检的决定，公安部、最高法只留下少数人维持工作。

1975 年宪法又作出了由公安机关行使检察权的规定，实质是取消了实际的检察活动，只剩下一个名义，以便在形式上履行一些批捕、起诉的法律手续。监狱里的郭子光并不清楚如此规定，他仍在申诉。

1977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下达了修改宪法意见的通知，全国有 19 个省、市、自治区提出了重设检察院的建议，理由是“文革”期间法治被破坏、公民权利被践踏、人民的生命安全毫无保证。此外，还有解放军 8 大军区、35 个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都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1978 年 3 月 1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近 3000 名全国人大代表表决通过了重新设立检察院的决议。3 月 5 日，77 岁的黄火青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随着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恢复，全国各省级地县级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院等专门检察院也相继恢复重建。

就在这期间，狱中服刑的郭子光，从《山西日报》上看到检察院恢复重设的消息。

“我觉得平反可能有希望了。”郭子光说，当时他没法直接给最高检写信申诉，而是将早已写好的近万字的申诉书，交给一名即将出狱的狱友，让狱友转交给他的妹妹。妹妹郭百聪连夜坐火车赶到北京，将材料交到了最高检的信访厅。

1979 年，最高检会同内蒙古检察院和山西检察院复查了郭子光的案件，并为郭子光平反。同年，郭子光被安置在包头机械局职工大学工作。

恢复检察系统后，郭子光是第一个被平反的，但因此获得平反的远不止他一人。据不完全统计，从 1979 年到 1984 年，全国共平反冤假错案 402000 多件，一部分是检察院直接平反纠正的，大部分是检察机关协同有关部门纠正的。

“文革”期间，很多人与郭子光一样，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不过，他们中很多人是被关进各地举办的“学习班”。但由于“左”倾思想影响，这种群众自我教育的场所，经常出现刑讯逼供等现象。

“文革”之后，一些地方和单位仍沿袭“学习班”的做法，对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人，采取变相的逮捕关押、刑讯逼供、限制人身自由等。

要命的小毛病

1813 年 8 月底，法军与第六次反法同盟在德累斯顿交战。在拿破仑亲自指挥两天后，联盟军被迫撤退。法军本来准备第二天发动一次歼灭性的打击，但恰在此时，拿破仑的老毛病又犯了。

第二天晚上，拿破仑精疲力竭，浑身湿透，饿得厉害，于是狼吞虎咽地大吃了一顿。但是 8 月 27 日晚，拿破仑开始出现严重的腹痛，呕吐也很严重，他不得不退回后方，把指挥权交给了手下，结果，法军大败，联盟军转败为胜。

两个月后的 10 月 17 日，法、俄在莱比锡决战。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拿破仑又一次因为腹痛和呕吐，倒在了后方，把指挥权交给了手下。结果当年 11 月，法军就被一路赶过莱茵河，最后败回了巴黎。拿破仑在元帅们的要求下，宣布放弃法国和意大利的王位。

小毛病带来滑铁卢之败

拿破仑流亡到厄尔巴岛，并在那里重整旗鼓。当他带着一支队伍耀武扬威地返回巴黎时，他的痔疮又犯了。拿破仑疼得不能走路，为了减轻痛苦，拿破仑弄来一辆马车，虽

年代拟定的主副食加在一起的 570 元，多不到 90 元，但这个费用也超出了当月毛泽东和江青工资的总和。说明在 20 世纪 60 年代，毛泽东的家庭和中国普通民众的家庭一样，工资收入的主要用途是糊口，吃是家庭支出的第一要事。毛泽东在伙食上的开支是实在的，至少说明，作为主席，他主要是在吃自己，不走公费，也没有各种各样的应酬、宴会、请吃、白吃。

最令人可感触的是账上明标的用液化气钱。尽管仅仅是 9.6 元，让我为之肃然起敬。住在中南海，公家的什么不能用，连个人的用气都在账上，你不能不承认，他在生活上对自己的严格约束。

(据《中国青年报》)

这里面，辽宁本溪彩屯煤矿的“法制学习班”是个典型。在 1978 年收押的 231 人中，绝大多数人是凭某个单位、某个领导人的一个电话或口头通知就被收押了，除依法处理的 31 人外，其余的 200 人，有的仅有一般违法行为，有的是无辜者，关押时间长的在半年、一年以上，短的也不少于 10 天、半月。所有人进去时先搜身、财物统一保管，不准带钱粮，不准外出买东西，不准回家，同家属见面要经过批准，工作人员在旁监视，劳动时有人监管，不准随便走动，如有违反便有体罚，体罚手段有 10 多种。

根据各地的反映，最高检调查研究后，认为“学习班”实为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违法乱纪行为，根据刑法，查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案件，属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管辖范围。

1979 年初，最高检党组就这一问题向时任中央纪委书记陈云写了专题报告，建议“学习班”一律撤销，严禁再办。专题报告引起了陈云等人重视，他们指示最高检以本单位的名义下达所属系统参照执行。

最高检原研究室主任赵汝琨说，检察院历史上有两次重大审判，一是审判二战战犯，二是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当时有人问是不是因为要审判两案，才恢复检察院的，这是个误解。”赵汝琨说，恢复检察院是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便于保障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恢复检察院解决了“文革”期间法治被破坏的局面。

(摘自《新京报》)

然短时间内痛苦有所减轻，但道路的崎岖以及车轮颠簸，让这种解脱持续时间很短。

痔疮经常发作，让拿破仑无法骑马外出察看军队，也无法与战地军官们商讨战争局势，经常延误战机，这在滑铁卢战役期间尤为明显。拿破仑本来有机会击败拿破仑说联军，但是正如军事史专家贝克福德：“就是在从 1815 年 16 日下午 9 时到 17 日上午 9 时这 12 个小时内，这场战役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 1815 年 6 月 16 日这一整天，拿破仑都骑在马上，结果痔疮病发，疼痛难忍。当天晚上，拿破仑疼得整夜都睡不着，为了止痛，他在帐篷里抽上了鸦片。第二天，拿破仑直到早上 8 时才起床，到 11 时才重新指挥作战，结果又因为指挥错误，贻误了战机。

6 月 17 日，拿破仑又因为嗜睡和痔疮的疼痛，在掌握战略主动权之前浪费了 7 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以拿破仑的军事天分，击败敌人的机会还是有的，但是因为痔疮病发带来的一系列后续反应，让他失去了这个机会。滑铁卢一战，拿破仑因为身体状况不佳，不适于控制战役的进展，结果败得一塌糊涂，而且在有生之年，再也没有翻过身。

(据《人物周刊》)

“样板戏”的创作始末

“文革”期间，“样板戏”曾垄断全中国的舞台。前不久，记者走访了一些当年参加过“样板戏”创作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听他们讲述了几个亲历的关于“样板戏”的故事。

《红灯记》：从沪剧、京剧到电影

1963 年 10 月，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从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手中接过一个沪剧剧本，被要求将它改编成京剧《红灯记》。

唱惯了传统戏的艺术家们开始接触现代戏是个很大的挑战，唱念做打、舞美、化妆都要创新设计。戏中李玉和与王连举接头一场戏，两个人背对背，念台词“老李，鬼子的岗哨今天布置得很严密”，然后，两个人同时转回身，接着说“看样子一定有什么事”。用这个转身动作就把地下党接头的环境感体现出来了。

传统戏的唱腔和节奏缓慢，不适合演现代人的生活，所以音乐革新也是一大问题。“‘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就是在京剧唱腔的基础上吸收当时流行歌曲的节奏，又吸收地方戏的二八板创造的。”年过八旬的中国京剧院演员曹韵清说。他是原《红灯记》中侯宪补的扮演者。

观众今天看到的《红灯记》，并非 1964 年的演出版本。当年，领导看了会演后，建议突出李玉和的革命行动，加上“粥棚”李玉和和磨刀人接关系一场戏，而之前的这个情节是通过李玉和与李奶奶的对话，以倒叙的形式出现的。

1969 年，《红灯记》要从舞台演出拍成电影，又有一次大规模修改，此次剧情、音乐、舞美，都有一个大的改动。

电影版的《红灯记》把 3 个小时的舞台演出压缩到两个多小时，根据“三突出”原则，主要删减反面人物鸠山和王连举的戏份，又增加了正面人物李玉和的两个唱段。为了突出激昂的战斗豪情，电影版的《红灯记》还改用交响乐伴奏。

《沙家浜》：郭建光与阿庆嫂平分秋色
 “旋律越简单，越容易被记住，越普及。”马连良的嫡传弟子、当年《沙家浜》导演之一迟金生哼着《智斗》中的曲调说，《“智斗”中基本是流水板，节奏快，很简单”。

1969 年 9 月，迟金生接到领导传达的指示：《芦荡火种》名字改为《沙家浜》，剧情应更突出新四军的武装斗争，戏的结尾要“直接正面打进去”(打进汉奸胡传魁的家)。

原剧本来围绕阿庆嫂的地下斗争展开，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只是配角。结尾是胡传魁结婚一场，阿庆嫂带人化装成吹鼓手，混进敌巢，把胡传魁一伙一举消灭。

根据指示精神，编剧和导演苦思冥想了一星期，加入《奔袭》一场，即郭建光疗好伤后，杀出芦荡，连夜奔袭，攻进胡府。接下来的一场，在胡传魁结婚的现场，新四军从后院翻墙打进去，“正面进攻”胡传魁。

经过修改之后，郭建光的戏份堪与阿庆嫂平分秋色了。

《杜鹃山》：上面指示与秋收起义挂钩

1969 年，还在上海戏校做老师的黎中城接受任务，把话剧《杜鹃山》改编成同名京剧。同时，北京京剧院也在进行《杜鹃山》的创作。上面有领导表示：还是两股力量合作吧。

1970 年，黎中城和原话剧作者王树元被借调到北京京剧院，与汪曾祺和杨毓珉组成创作组，命名为“秋收起义创作组”。

“要在原话剧的基础上加上秋收起义的内容，因为上面的指示要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挂钩，宣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黎中城说。

因为对整个剧情作修改的难度太大，只能在唱词上想办法、做文章。在“家住安源”一场戏中有这样的唱词，“秋收暴动风雷骤，明灯照亮我心头。才懂得翻身必须枪在手，参军入党，要为那天下的穷人争自由。工友和农友，一条革命路上走。不灭豺狼誓不休！”在剧情上，他们把柯香的身份改为井冈山派来的党代表。

(摘自《老同志之友》)

欧洲历史因拿破仑疾病而改变

拿破仑在俄国的溃败，有很多战略原因，也有疾病的原因。由于斑疹伤寒的毁灭性打击，拿破仑的数十万军队，最后能够重新踏上法国土地的，不足 6000 人。战争期间拿破仑本人身体状况的恶化，也加速了法军的失败。

不规律的生活习惯导致患有两种疾病

拿破仑是伟人，但和平常人一样，他也有衣食住行的需求。然而，伟人的工作性质，又使他需求实现与平常人有着天壤之别。

由于强大的工作压力，拿破仑忽略了自己身体的健康需要。每天只睡 3 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拿破仑吃起来不分好坏，还喜欢狼吞虎咽，吃饭的时间也不固定，总是在办事的空隙见缝插针，吃饭的时间也不会超过 12 分钟。这种饮食作息习惯，显然不利于他的健康。

生活习惯无规律，让拿破仑得了两种不算严重，却对其军事生涯影响至深的毛病。一是由长期的便秘引起的痔疮，二是消化道溃疡。拿破仑在 28 岁时患上了常见但很疼痛的病——痔疮，5 年后，糟糕的饮食习惯又让他得了消化道溃疡。据

拿破仑的首席秘书福弗莱·布列纳记载，拿破仑在 1802 年开始感到肚子疼，他经常靠向右侧，背心纽扣解开，疼得龇牙咧嘴。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就大叫几声：“啊，疼死我了！”

1804 年，35 岁的拿破仑加冕称帝。从这一年开始，他的体力开始退化。首先是他的肚子大了起来，然后脸庞变圆，脖子变粗，头发也越来越稀。本来拿破仑就是个矮，这样一来，他从外表上看就是一个矮胖子。

脾气与智力都因之改变

与体质衰退同时出现的，还有脾气和智力的明显改变。由于疾病的折磨，拿破仑失去了曾经最引以为豪的自律，脾气不像以前那样得到控制。

海军大臣德尼·德克雷曾经这样抱怨拿破仑：“皇帝病了，他会毁掉我们所有人。”这一点，梅特涅公爵在 1807 年也注意到了。他说，拿破仑的行为方式完全改变了，“他似乎认为自己已到这样一种状态，克制已成了没有用处的阻碍”。

由于疾病的折磨，拿破仑丧失了以前的敏捷和果断，而在他的军旅生涯中，痔疮和消化道溃疡几乎改变了他的后半生。